

茅盾研究
八十年書系

錢振綱·鍾桂松◎主編

21

茅盾文藝美學思想論稿

史瑤、王嘉良、錢誠一、駱寒超◎著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茅盾研究
八十年書系



錢振綱·鍾桂松◎主編

史瑤、王嘉良、錢誠一、駱寒超◎著

21

茅盾文藝美學思想 論稿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茅盾文藝美學思想論稿／史瑤、王嘉良、錢誠一、駱寒超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民 103〕

目 2+228 面；19×26 公分

（茅盾研究八十年書系：第 21 冊）

ISBN：978-986-322-711-3（精裝）

1. 沈德鴻 2. 學術思想 3. 文藝評論

820.908

103010301

中國茅盾研究會《茅盾研究八十年書系》編委會

主 編：錢振綱 鍾桂松

副主編：許建輝 王中忱 李 玲

特邀顧問：

邵伯周 孫中田 莊鍾慶 丁爾綱 萬樹玉 李 岫

王嘉良 李廣德 翟德耀 李庶長 高利克 唐金海

ISBN-978-986-322-711-3



9 789863 227113

茅盾研究八十年書系

第二一冊

ISBN：978-986-322-711-3

茅盾文藝美學思想論稿

本書據杭州大學出版社 1991 年 3 月版重印

作 者 史瑤、王嘉良、錢誠一、駱寒超

主 編 錢振綱 鍾桂松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 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4 年 7 月

定 價 60 冊（精裝）新台幣 12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茅盾文藝美學思想論稿

史瑤、王嘉良、錢誠一、駱寒超 著

作者簡介

史瑤（1928～2013），原名包維嶽，浙江東陽市人，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曾任中國茅盾研究會常務理事，浙江省茅盾研究會會長。著有《論茅盾的小說藝術》，主編《論茅盾的創作藝術》、《中國革命與茅盾的文學道路》等。

王嘉良，1942年生，浙江紹興市上虞區人，浙江師範大學教授，中國茅盾研究會副會長。著有《茅盾小說論》、《藝術範型與審美品性——論茅盾的創作藝術與審美理論建構》等，2011年出版《王嘉良學術文集》（12卷）。

錢誠一，1945年生，浙江杭州市人，浙江大學城市學院教授。任中國茅盾研究會常務理事。著有《關於《蝕》三部曲的評價問題》、《茅盾的文藝批評主體論》等。

駱寒超，1935年生，浙江諸暨市人，浙江大學教授，詩學研究專家。曾任浙江省茅盾研究會副會長，主編《論茅盾的創作藝術》等。2009年出版《駱寒超詩學文集》（12卷）。

提 要

本書所論茅盾的文藝美學思想，並非是指從哲學美學的抽象命題或基本範疇出發營構的純美學體系，而是茅盾從我國新文學實踐中總結出來的一系列關於文藝基本問題的美學思考，涉及其對藝術美本質的揭示、對藝術審美創造活動的把握、藝術美與真實性、功利性的理解，及其文體美學觀、文藝批評觀等，這些命題雖各自獨立又互相聯繫，構成了茅盾的特色鮮明而又獨樹一幟的文藝美學思想體系。茅盾作為一位社會意識極強的現實主義作家，其對藝術美本質的認知，自然偏重在藝術的社會功能的認知上，強調了藝術美與主客觀的雙重關係，注重藝術美的真實性和功利性價值，突出藝術美的集中顯現是在於展示「真和美」。基於此，他審視藝術審美創造活動，便十分重視文學的「社會化」和「理性化」，既要求作家充分發揮創造者的主題創造精神，又需具備形象思維和邏輯思維兩種思維相結合的藝術思維結構。這一美學思想體系運用於文學批評實踐，使他把文藝批評看成是一種審美再創造，營構了一種注重「社會選擇」的批評模式；運用於對各種文學文體的觀照，則形成了其獨特的文體美學觀，產生了別具一格的小說美學、詩歌美學、戲劇美學、散文美學等。



目

次

引論：茅盾的文化心理結構及其建構過程	1
第一章 藝術美的本質	19
第一節 藝術美與文藝的獨特性	19
第二節 藝術美與主客觀關係	27
第三節 藝術美與獨創	40
第二章 藝術美與真實性、功利性	57
第一節 藝術美與真實性	57
第二節 典型——真和美的集中表現	68
第三節 藝術美與功利性	86
第三章 藝術審美創造	101
第一節 藝術創造把握客體的要求：充分的「社會化」	102
第二節 藝術創造須充分發揮創造者的主體創造精神	110
第三節 重視「理性化」——藝術創造對社會的深層透視	120
第四節 提倡兩種思維相結合的藝術思維結構	129
第四章 文藝批評觀	137
第一節 文藝批評是一種審美再創造	137
第二節 批評的「社會選擇」：一種批評模式的營構	144
第三節 批評家：作為審美再創造的主體	152
第四節 批評意義的深層揭示：批評是「運動著的美學」	163
第五章 文體美學：對藝術美的特徵和創造的具體把握	171
第一節 小說美學	172
第二節 詩歌美學	189
第三節 戲劇美學	199
第四節 散文美學	212
後 記	225

引論：茅盾的文化心理結構及其建構過程

茅盾的文藝美學思想，不是從哲學美學的抽象命題或基本範疇出發，「自上而下」地以思辨演繹營構起來的純美學體系，而是從我國新文學運動的具體實踐中，「自下而上」地歸納總結出來的一系列關於文藝基本問題的美學思考，並以其鮮明的特色和完整的構造而自成體系。它深深地植根於現代中國社會生活的現實土壤，受到民主革命運動特別是啓蒙救亡時代主題的深刻影響。但這種影響的閾限和程度，卻又爲茅盾的自身條件所制約，並在很大的程度上決定了他的文藝美學思想的理論成色和基本格局。離開茅盾的自身條件而僅從時代社會的影響著眼，就無法對他的理論個性作出真切的說明。而集中體現茅盾自身條件的，就是他的文化心理結構。因此，在展開本書各章之前，有必要首先對茅盾的文化心理結構略加審察。

文化心理結構並不是主客體之間的某種靜態層隔，而是一種主體活動的功能結構。它由諸多相互關聯而又相互作用的層次和要素所組成，其中最主要的層次是：心理素質、價值體系和思維方式。我們對茅盾文化心理結構的檢視也將循此進行，並在把握其基本特點後，進而追溯它的建構過程。

（一）

在茅盾的文化心理結構中，心理素質這一層次顯示著他的人格理想、情感世界和意志結構方面的特徵。

茅盾少有大志。早在小學時代，他就誓言將來要「著作一種偉大的小說，成一名家」，並因而奮勉自勵，「以異日之文豪自期」。^{〔註1〕}這種具體形象理

〔註1〕 志堅《懷茅盾》，《文壇史料》，上海中華日報社1944年出版。

想，到中學時代發展為更高遠的概括性理想。就讀湖州中學時，曾以《志在鴻鵠》為題作文，借「鴻鵠高飛」自訴抱負。〔註2〕甚至還不無偏頗地認為，一個中學生非有「吞下整個世界」的「氣魄」不可，「如果有誰不覺得整個世界是他的，那他就一定不是好中學生」。〔註3〕這種少年意氣，不是對個人名利地位的無限欲求，而是一種渴望建功立業兼濟天下的公民責任心和歷史使命感。更可貴的是，他那「熱血塗湧」的「狂氣」，〔註4〕非但沒有為歲月的苦雨淒風浸蝕薰軟，反因投身時代的驚濤駭浪而更趨堅實。「五四」時期，接受馬克思主義和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人生抉擇，使他高遠的人格理想獲得了更為切實崇高的時代內容，實現了新的昇華。他以挽救國家民族危亡、鏟除人民苦難的根源，進而解放全人類為己任，並為這偉大的理想而「追求奮鬥了一生」。〔註5〕

如此高遠的人格理想，必有與之相應的情感意志。透視茅盾的情感世界，可以發現三個顯著的特點：一是博大深厚。捷克漢學家嘎利克指出：「茅盾是一位政治的、社會的作家。『個人的區區小事』，是不能吸引住他的，只有那偉大的政治和社會問題才最使他激動不安。」〔註6〕確實，茅盾熱切關注的是時代風雲的變幻，深情繫念的是廣大人民的禍福，一代青年的沉浮。他從不為個人的進退得失悲歡離合耿耿於懷，卻總是為民族安危革命成敗憂慮感慨。他的情緒感受無不順應著人民大眾的喜怒哀樂，與他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茅盾的情感內容，以其鮮明的時代性、廣闊的覆蓋面和強大的凝聚力顯示出博大與深厚。二是含蓄內蘊。茅盾博大深厚的情感內容，其存在方式卻是含蓄內蘊而非顯露外燦的。早就有人說過，茅盾「具備一個文藝家所必須具備的熱烈豐富的情懷，不過他不是外燦而是內蘊罷了」。〔註7〕「他

〔註2〕 分別見《我走過的道路》（上）第77、68、78、14、51、64、89、11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

〔註3〕 《我的中學生時代及其後》，《印象·感想·回憶》，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出版。

〔註4〕 《我的中學生時代及其後》，《印象·感想·回憶》，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出版。

〔註5〕 《致中共中央》，《茅盾書信集》，文化藝術出版社1988年出版。

〔註6〕 嘎利克《茅盾的〈林家鋪子〉及其短篇小說》，《茅盾研究》第1輯第303頁，文化藝術出版社1984年出版。

〔註7〕 東方曦《懷茅盾》，《作家筆會·春秋文章》第1集，上海春秋雜誌社1945年出版。

的表面冷靜得就像一塊寒光閃閃的鋼鐵，而他的內心卻潛伏著無限的熱和力」。^{〔註8〕}這內蘊的情熱自然也有直捷明快的抒發，甚至難以控遏的傾瀉，但其總體特徵卻並不表現為外在的熱烈性而在含而不露、外冷全熱的蘊藉性。茅盾較少狂熱的吶喊和激越的呼號，誠如他自己說的那樣，「素來不善於痛哭流涕劍拔弩張的那一套志士氣概」。^{〔註9〕}三是以理節情，茅盾既有博大深厚的情感，又有尖銳清明的理性，並且是「一位理智勝於情感的人」。^{〔註10〕}在「情」、「理」關係上，他有一個牢不可破的信條：「離開了思想而言情緒，這情緒是沒有內容的；不問思想之如何而侈言情緒，這情緒是沒有價值的」。^{〔註11〕}因而他總是自覺地用理性來檢驗、引導和調節情感及其展露情感，使自己的情感世界時時處於理性思維的嚴格規範之下，呈現出以理節情、理重於情的明顯特點。

高遠的人格理想和博大的情感世界，又決定了茅盾意志結構的堅定性、頑強性和獨立性特徵。從小學時代為實現成一「文豪」的意願而奮發讀書用心作文，到「五四」時期確立共產主義理想並為此矢志不渝奮鬥終生，以及對以理統情、自我品性修煉的一貫強調和身體力行，充分顯示出茅盾意志的堅定性。在人生追求的漫漫長途中，茅盾幾經坎坷屢遭危難，但始終堅持真理自強不息。誠如他自己所說：「摸索而碰壁，跌倒了又爬起，迂迴而再進」。^{〔註12〕}堅不可摧的理想信仰和永不銷歇的獻身激情，賦予他「處絕境而不灰，臨大難而不懼」，^{〔註13〕}百折不撓堅韌不拔的頑強意志。而茅盾人生追求和獻身激情的理性自覺，更使他的意志具有不屈從任何外來壓力和影響的獨立自主性。他晚年回顧說，「自從離開家庭進入社會以來，我逐漸養成了這樣一種習慣，遇事好尋根究底，好獨立思考，不願意隨聲附和」。^{〔註14〕}這種獨立自主的現代意識，使他即使對古聖時賢的主張，也必「先經過自己理性的審考」^{〔註15〕}而決不一概盲從。因為在他看來，「好古與趨時正是一件事底兩面，都

〔註8〕 黃果夫《記茅盾》，《人物種種》，「雜誌社」編輯部1943年出版。

〔註9〕 《從牯嶺到東京》，《小說月報》第19卷第10號，1928年10月。

〔註10〕 東方曦《懷茅盾》，《作家筆會·春秋文章》第1集，上海春秋雜誌社1945年出版。

〔註11〕 《從思想到技巧》，重慶《儲匯服務》第26期，1943年5月。

〔註12〕 《回顧》，重慶《新華日報》1945年6月24日。

〔註13〕 《學生與社會》，《學生雜誌》第4卷第12號，1917年12月。

〔註14〕 《我走過的道路》（中）第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出版。

〔註15〕 《佩服與崇拜》，《時事新報·學燈》，1920年1月25日。

是忘了自己」。^{〔註 16〕}茅盾的一生經歷和言行表明，他不是隨波逐流的小草，而是獨立不倚的大樹。

理性心理傾向，清醒理智態度，內蘊情感方式，以及理想高遠、意志剛強、胸襟豁達、氣度恢宏的大家氣質，茅盾心理素質中這些最穩定的「基因」，構成了他心理性格的主要側面。

茅盾文化心理結構的又一層次是其價值體系。這裡所顯示的主要是他人生態度、道德要求和審美情趣方面的基本特點。

茅盾自小就對歷史上那些「挽時艱，振國威」、除暴安良、「廓清天下，出萬人於黑海之中」的英雄豪傑充滿敬仰之情，把他們當作自己的榜樣。^{〔註 17〕}包蘊在這種英雄崇拜中的「濟世」理想、獻身激情以及作為它們心理動因的社會責任心和歷史使命感，內在地決定了他的「入世」思想和參預意識，並外化為執著現實樂觀進取的人生態度。茅盾崇拜莊子但反對他「一切達觀，超出於形骸之外的出世主義」；^{〔註 18〕}敬重屈原、韜庵而否定他們「怨世自沉」的消極悲觀態度。^{〔註 19〕}在他看來，前者「最好不過造成一種不關社會痛癢，不同民生痛苦，樂天安命，聽其自然的廢物，下焉者且成為阿諛依違，苟且媚世的無恥小人」；^{〔註 20〕}而後者，沉江蹈海的悲壯之舉，雖或有「振俗發愚」的「警世」之效，但「輕棄有用之才，與波臣為伍」，則「大廈誰支？柱石孰撐？」茅盾認為，「大丈夫抱濟世之才，處有為之時，當待時而進，豈宜長老林泉，自樂其年？又豈宜悲忿自戕，鬱鬱而死哉？」縱使懷才不遇或無力回天，亦當「退守園林，或廣遊天下，以待天時」，而不該「怨忿悲鬱」，「棄絕國事」。^{〔註 21〕}茅盾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又具有兩個顯著特徵：一是執著現實，直視前途。他既不依戀感傷於「過去」，亦不冥想空誇著「未來」。而是冷靜、清醒、勇敢地「凝視現實，分析現實，揭破現實」。^{〔註 22〕}並表現出一種不計利鈍的堅執態度：「我們現在只知努力，有燈就點，不計光之遠近；眼

〔註 16〕 《獨創與因襲》，《時事新報》附刊《文學旬刊》，1922 年 3 月 11 日。

〔註 17〕 參見茅盾小學作文《富弼使契丹論》、《武侯治蜀王猛治秦論》等，《茅盾少年時代作文》，光明日報出版社 1984 年出版。

〔註 18〕 《莊子（選注本）緒言》，《莊子（選注本）》，商務印書館 1926 年出版。

〔註 19〕 《論陸靜山蹈海事》，《茅盾少年時代作文》。

〔註 20〕 《莊子（選注本）緒言》，《莊子（選注本）》，商務印書館 1926 年出版。

〔註 21〕 《論陸靜山蹈海事》，《茅盾少年時代作文》。

〔註 22〕 《寫在〈野薔薇〉的前面》，《野薔薇》，大江書舖 1929 年出版。

前有路就走，不問路之短長」。^{〔註23〕}二是認真細心，謹言慎行。茅盾直面人生積極進取，但從不狂熱盲動，「流於魯莽暴躁」。^{〔註24〕}他一生謹言慎行，事事嚴謹頂真，無論「在治學，治事，私生活，——各方面，都認真而細心」，以為這是一個革命家、藝術家應有的「德性」。^{〔註25〕}

茅盾一貫講求「修身立德」，注重內向自省和品性修煉，善於培養自己的「浩然之氣」。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茅盾道德自律的目的，並非僅僅為了把自己修養成德行高尚的君子，陶醉於人格的自我完滿和道德的自我完善，而主要是為了以身作則，帶動他人推及整個社會。這可以從他的《學生與社會》一文中得到印證：「……故使學生而克守厥分，能饜人望，自足以轉移風化，而堅社會之信仰。反是，肆行妄作，不知自檢，授人以可乘之隙，而引起人民嫉惡之念，其失敗可立至」。「是故學生在學之時其一舉一動，胥於社會有輕重，安可放縱恣肆而竄閒，以自敗敗人耶！」^{〔註26〕}很明顯，自我道德修養的終極目的，還在實現匡時濟世改造社會的政治抱負。第二，茅盾道德要求的內容，受其人格理想、情感世界和人生態度的深刻影響，以突出自我的人格價值及其所負的道德責任和歷史使命為特徵，因而集中於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崇尚氣節操守。茅盾從小對那些「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大丈夫心儀神往。小學時曾在作文中對出使契丹「上不辱命，下不失節」的北宋外交家富弼深表欽佩，甚至表示「為之執鞭」也十分「欣慕」。^{〔註27〕}這種「童年情結」終於發展為堅定不移的道德要求，貫徹於一生的立身行事之中。馬寅初在慶祝茅盾五十壽辰的會上表示，他之所以趕來祝賀，就因為茅盾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品格。^{〔註28〕}王若飛撰文指出，茅盾「有一個最大的特點為人們所不能忘，就是他『有所為，有所不為，他經歷了好些艱難困苦，只因中有所主，常能適然自得』」。^{〔註29〕}二是強調奮

〔註23〕《致張侃》，《小說月報》第13卷第8號，1922年8月。

〔註24〕《從牯嶺到東京》，《小說月報》第19卷第10號，1928年10月。

〔註25〕《謹嚴第一》，《文藝陣地》第2卷第1期，1938年10月。

〔註26〕《學生與社會》，《學生雜誌》第4卷第12號，1917年12月。

〔註27〕參見茅盾小學作文《富弼使契丹論》、《武侯治蜀王猛治秦論》等，《茅盾少年時代作文》，光明日報出版社1984年出版。

〔註28〕參見《重慶文化界慶祝茅盾先生五十壽辰》，延安《解放日報》，1945年7月9日。

〔註29〕王若飛《中國文化界的光榮，中國知識分子的光榮》，《新華日報》，1945年6月24日。

鬥精神。茅盾以奮鬥爲「立身之第一事」，因而登上文壇就大聲疾呼剔除「以退讓爲美德，守拙爲知命」的陳腐道德說教，積極倡導以奮鬥進取爲「人生之天職」，「紮硬寨打死仗」，從苦戰求「真樂」的新道德觀。而他所張揚的涵養「奮鬥習慣之不二法門」：「抱定人定勝天之旨，而以我力爲萬能也；養成隨事注意之習慣，不被迷於表面而含混了之也；以一生之行事，編立一定之計劃，而節節實現之也」，〔註 30〕就是他實踐這一道德要求的切身體驗。三是躬行人道主義。茅盾認爲，「古往今來偉大的文化戰士，一定也是偉大的 Humanist（人道主義者——引者）；換言之，即是『最理想的人性』的追求者、陶冶者、頌揚者」。事實上，茅盾自己就正是這樣一位偉大的人道主義者。「拔出『人性』中的蕭艾，培養『人性』中的芝蘭」，〔註 31〕成爲他一生事業的概括。從把婦女當「人」看待的嚴正要求，〔註 32〕「改造人們使他們像個人」的急切呼籲，〔註 33〕「人貴自樹」的堅定主張和對「以地球爲一家，以人類爲一家族」這一人類終極前途的熱情嚮往，〔註 34〕無不閃爍著茅盾道德要求和倫理內容中的人道主義光芒。但茅盾既有偉大的愛，也有神聖的憎。絕不是無條件的博愛論者。他熱愛人民大眾，憎惡戕賊人性的專制制度；同情弱小民族，痛恨恃強凌弱的強權政治；抨擊一切「阻礙『人性』向真美善發展的種種人爲的桎梏」，以追求和闡揚「最理想的人性」爲自己「最大最終極的目標」。〔註 35〕這種明確的是非，強烈的好惡，顯示出他人道主義的鮮明傾向性和道德評判的堅定原則立場。茅盾的人道主義思想在發軔之初由於更多地與個性主義相聯繫而存在某些抽象人類性的弱點，但不久經過馬克思主義的「醇化」而注入歷史和階級的因素後，就超越這種局囿並發展爲人道主義的最高形態——以階級性、實踐性與人性全面自由發展的歷史統一爲標誌的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

構成茅盾價值體系的還有其審美情趣，它顯示著茅盾審美活動的特有傾向性。茅盾的審美興趣是相當廣泛的，但早在童少年時代就表現出一種於廣

〔註 30〕《1918 年之學生》，《學生雜誌》第 5 卷第 1 號，1918 年 1 月。

〔註 31〕《最理想的人性》，《筆談》第 4 期，1941 年 10 月。

〔註 32〕《「一個問題」的商榷》，《時事新報》1919 年 10 月 30 日。

〔註 33〕《介紹外國文學作品的目的》，《時事新報》附刊《文學旬刊》，1922 年 8 月 1 日。

〔註 34〕《讀〈少年中國〉婦女號》，《婦女雜誌》第 6 卷第 1 號，1920 年 1 月。

〔註 35〕《最理想的人性》，《筆談》第 4 期，1941 年 10 月。

泛愛好中特別追求風骨氣勢，傾心恢宏闊大、深沉悲壯的審美心理定向。當時他最喜歡的歌曲是「曲調悲壯」的《黃河》，甚至直到晚年仍能背誦它的第一節歌詞。〔註36〕這種審美追求更集中地表現在他的小學作文中，尤其是那些「史論」，非但顯出他「讀史有眼，立論有識」，而且大多「氣勢雄偉，筆鋒銳利」。〔註37〕中學時代，既對《莊子》「汪洋恣肆的文筆」心馳神往，〔註38〕更爲那些鼓動「掃除虜穢，再造河山」的檄文長歌激動不已。〔註39〕茅盾後來寫的《我閱讀的中外文學作品》〔註40〕一文清楚地表明，萌發於童年時期的審美心理定向，爾後不僅沒有改變，還因諳世更趨深廣而進一步固置和強化。熱愛以揭示現實人生爲己任的巨匠大師，「喜歡規模宏大，文筆恣肆絢爛的作品」，讚美文藝的時代性、社會化表現，激賞整體性反映社會歷史生活的史詩品格……，這種集中體現茅盾文藝美學理想的審美情趣，不僅同他的人生觀密切聯繫並與之契合一致，而且又以主觀愛好的形式顯示著他對客觀事物的認識和評價，從一個特定的角度反映著他的精神意向和實踐要求。茅盾的文學選擇意識以及他對傳統和異域文藝養料的吐納取捨，無疑受到這種審美情趣的深刻制約。

處於茅盾文化心理結構最高層次的是他的思維方式。它既以世界觀的形式調控著整個結構的方向性，又以理性的內容滲進各個要素之中。茅盾理論思維主要特徵的某些「基因」和端緒，在他的子學作文裡就已有跡可尋。無論是《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論》對「毀」「譽」及其標準的深入分析，《崔實謂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論》對用法「寬」「嚴」的辯證理解；還是《信陵君之於魏可謂拂臣論》洗刷無忌「竊符之罪」的種種辯白，《武侯治蜀王猛治秦論》比較兩者功過是非的條條理由，無不閃爍著少年茅盾思辨力量的犀利鋒芒。而《馬援不列雲臺功臣論》和《宋太祖杯酒釋兵權論》對成說定論的有力駁詰，《管子稱天下之才而孔譏器小孟斥功卑試論其故》對聖人之言的大膽否定，又顯露出茅盾思維的懷疑主義和否定性特色的最初光華。如果說，

〔註36〕分別見《我走過的道路》（上）第77、68、78、14、51、64、89、11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

〔註37〕參見茅盾小學作文上老師的批語，《茅盾少年時代作文》。

〔註38〕《良好的開端》，《人民日報》，1954年12月9日。

〔註39〕分別見《我走過的道路》（上）第77、68、78、14、51、64、89、11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

〔註40〕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2年第1輯，北京出版社1982年出版。

《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天年主人之雁以不材而死試申其說論之》圍繞「材」與「不材」的議題，以虛帶實、從古至今、由遠及近的層層論析，顯示了茅盾思維空間的開闊性，那麼，《西人有黃禍之說試論其然否》、《秦始皇漢高祖隋文帝論》諸篇廣徵博引、連類舉譬的滔滔文思，則反映了他致思趨向的活躍性；而《家人利女貞說》、《言寡尤行寡悔釋義》等文闡釋經典與自創新見的結合，又釀成了日後茅盾思維兼容性與獨創性辯證統一的特色。

從茅盾「五四」時期的文論中可以看出，上述思維特徵得到了繼續發展並形成了以科學論證和綜合分析為總體特色的思維方式。貫穿其間的科學精神和分析方法，大大提高了茅盾思維的嚴密性和準確度。他以文藝現象所提供的大量感性材料和思想資料為思維對象，並在對它們的比較、歸納和概括中，排除偶然性因素，抽取本質的東西，從而透過紛繁雜陳的文藝現象把握藝術的本質和規律。由於注重科學「抽象」的分析和強調邏輯推理的論證成為基本運思方式，具有確定內涵、可以知性分解和清晰表述的概念成為主要思維工具，因而超越了僅僅基於審美經驗的直觀感悟，不僅顯示了思維過程的準確規定性，並賦予思維成果以更加抽象從而也更具普遍性的品格；而以探求藝術真諦和發展規律為思維目的，又使之具有恩格斯所謂的那種「徹底的深思精神或深思的徹底精神」。^{〔註41〕}值得注意的是，茅盾倚重理論概念但缺乏名實之辨的興趣愛好，因而很少對它們的內涵外延作出嚴格界說，也並未建立自己完備統一的概念系統；他搭起了一個相當龐大的理論框架；卻無意用一以貫之的思辨邏輯精心維繫其內部構件，使之成為一個秩序井然結構謹嚴的形上體系，而這本來應該是「徹底的深思精神」的首要思維目標。巨大的理論熱情和「徹底的深思精神」之所以並沒有把茅盾引向純思辨的形上世界，關鍵不在他缺乏相應的思辨力量，而在他另一思維特點的深刻影響：由於實用理性精神的內在制約，決定了他傾心現世人生，偏重「經世致用」的致思趨向。在他看來，深入領悟和把握藝術與時代、社會、人士的相互關係，悉心探究現實社會要求、時代歷史課題與藝術自身規律的完滿融合，遠比對藝術本體論意義抽象的哲理沉思更有價值也更富魅力。因此，他無意形而上的追求，在遠離現實的思辨王國裡實現永恆價值；卻執著現實性的思考，於解答切近人生的時代課題中求得某種超越。這種思維取向對茅盾具有雙重

〔註41〕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英文版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79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

影響：一方面，導致了對思辨理性某種程度的忽視與輕慢，從而阻滯了茅盾理論的深入發展和充分開拓，使之未能更大限度地超越時空，以發揮更為深遠的影響。但另一方面，則不僅釀成了茅盾以強烈的現實性、社會性為特徵的理論個性，為新文學提供了寶貴的理論風範；而且更重要的是，又以常醒的理智態度，構成了對非理性、反理性主義思潮的強大頡頏。茅盾承認，「在我，尖銳的理性總不肯讓我跌進了玄之又玄的國境，讓幻想來撫摸來安慰了現實的傷痕，我總覺得，……我是夢的仇人」。^{〔註42〕}實用理性的致思特點，使他從不陷入夢幻和迷狂而始終具有清醒的現實感和深沉的歷史意識。

以上的粗略檢視，雖然還不能全面把握茅盾文化心理結構的所有要素，但其主要層次和基本特點已大體清楚。這些特點，尤其是入世思想、事功態度、理性精神、內蘊情感和人道主義理想，以及集中體現其心理特徵的大家氣質，不僅對他的審美創造活動，而且也對他的藝術美學理論建構，具有強大的內在制導作用。

（二）

文化心理結構並非基因遺傳的產物，而是人們在生活和活動過程中逐步建構起來的。一個民族特定世代的每個成員一俟降臨人世，「便生存於一定的氣候、地形、動植物群地帶的自然環境之中，同時也進入一個由一定的信仰、習俗、工具、藝術表達形式等所組成的文化環境」，^{〔註43〕}生活和活動於該民族歷史文化傳統的特殊氛圍之中。列寧甚至認為，當人們還在母親懷裡吃奶時就受到了傳統的影響。^{〔註44〕}當然，「傳統」並不是一成不變、固定化了的始終同一之物，隨著歲月流逝時代嬗遞，它也在不斷地變化發展，雖則常常緩慢得幾乎難以察覺。因此，以傳統文化為根基的個體的文化心理結構，也並不是一勞永逸地塑造好了的「形而上實體」，而是一個動態性的建構過程。隨著時代的變遷，必有社會的變遷、文化的變遷，從而也就必然有文化心理結構的變遷。但這並不能改變以下基本事實：傳統文化的背景知識形成了人們文化心理結構的基本格局；而他們對傳統文化的接受和習得，一般又總是

〔註42〕《嚴霜下的夢》，《文學週報》第6卷第2期，1928年2月。

〔註43〕懷特《文化科學》第157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註44〕參見列寧《共青團的任務》，《列寧選集》第4卷第354頁，人民出版社1960年出版。

從家庭影響和學校教育開始的。基於此，我們對茅盾文化心理結構的溯源，也將側重在這兩個方面，並以家庭特別是雙親的影響為起點。

1896年7月4日，茅盾誕生在浙江省桐鄉縣烏鎮一戶姓沈的大家庭裡，他是沈家的長房長孫。

烏鎮是浙江最富庶的杭、嘉、湖地區一個熱鬧的水鄉集鎮。它地處水陸要衝，為兩省、三府、七縣交界之地。〔註45〕這裡河道如網水街相依，稻田桑地阡陌交錯，素有魚米之鄉的美稱。不僅商品經濟發達，而且歷史文化悠久。早在6000多年前，當地譚家灣一帶就有人類繁衍生息，是新石器時代馬家濱文化的一處遺址。古老的歷史留下了眾多文化遺跡。梁昭明太子蕭統為母祈福修建的寶塔和他與沈約偶居讀書的「昭明書室」，以及建於梁代的石佛寺、宋代的「百花莊」和陳簡齋讀書處等古蹟並稱「烏青八景」。烏鎮自唐代開始迅速發展，至清乾嘉時最為繁榮。當時「居民相接，煙火萬家」，繁華不下於中等縣城。後來雖遭戰亂元氣大傷，但就其地域之廣、人口之眾、經濟繁榮之程度，仍非一般縣城可比。茅盾的童少年時代就是在這樣一個歷史悠久、經濟發達，又瀰漫著濃鬱文化氛圍的地方度過的。

沈家雖非當地名門望族，卻也是詩禮之家。茅盾比當時一般世家子弟幸運的是，不但祖父是個「樂天派」，〔註46〕而且雙親尤為開明通達。

祖父是前清秀才，但並不用功舉業。「對於兒孫的事，素來抱了『自然主義』」，〔註47〕理由是「兒孫自有兒孫福，不替兒孫作牛馬」。〔註48〕他執掌家塾卻常常丟下學生去聽說書或搓麻將，對長孫也並不格外看重而嚴加管束，卻經常帶他上街、訪友。茅盾雖未從祖父那裡得到什麼特別的啟發，但使他自小較少受到封建束縛而獲得更多自由發展和接觸人生的機會。

給少年茅盾以深刻影響的是他的雙親。父親沈永錫16歲考中秀才，但內心厭惡八股。加之眼見父輩不事生產，憂慮日後坐吃山空無以為生，因而無意舉業，師從岳父學醫。他是中醫，但也涉獵西醫西藥，並無一般儒醫的門戶成見和保守思想。甲午之戰的慘敗，使他的憂慮由家族前途而民族安危，

〔註45〕舊指江蘇、浙江兩省，湖州、嘉興、蘇州三府和烏程、歸安、崇德、桐鄉、水、吳江、震澤七縣。

〔註46〕《我的小傳》，《文學週報》第1卷第1號，1932年6月。

〔註47〕《我的小傳》，《文學週報》第1卷第1號，1932年6月。

〔註48〕分別見《我走過的道路》（上）第77、68、78、14、51、64、89、11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

並在變法聲浪波及烏鎮時成了當地維新派中的一員。科學民主思潮的影響和富國強兵的理想，使他酷愛數學和聲光化電，篤信實業救國，同時廣泛閱讀介紹歐美各國政治經濟制度的書刊。他為變法維新的煌煌政令所振奮，曾計劃東渡日本留學或北上京師深造，極想為振興國家做一番事業。他的維新思想影響了妻子並規約著對兒子的教育。他認為妻子以前讀的四書五經之類不切實用，鼓勵她改習經邦濟世的新學問，也希望茅盾將來「做工業中人」。^{〔註 49〕}為了引導兒子學習「新學」，還親自選定《字課圖說》和《天文歌略》、《地理歌略》一類「新書」作教材，並指定由妻子講授。因為他對父親的教學從內容到方法都不以為然，甚至寧可讓兒子進親戚的私塾也不在家塾接受舊學啟蒙。後來鎮上辦起第一所新式小學時，他就送兒子去那裡讀書，使茅盾成了「立志小學」的首批學生。父親對茅盾既要求嚴格，又頗為開明。他雖然為兒子「不近」數學或沒有熟讀《天文歌略》而納悶氣惱，但得知兒子在偷看當時被視為閒書的小說時，卻並不禁止。以為「看看閒書也可『把文理看通』」，^{〔註 50〕}還特地挑選沒有插圖的《後西遊記》給他看，免得他只揀插圖有趣的回目而不能從頭讀完。

父親的一生，赤誠愛國追求真理，勤奮好學從不懈怠。他身患絕症病臥三年，但愛國熱忱並未因此稍減，讀書求知從無一日間斷。在病榻上仍舊熱心閱讀鼓吹革命的報刊，堅持自修高等數學。甚至病到全身肌肉落盡，手無捧書之力的地步，還要妻兒拿著翻開的書籍豎立在他胸前讓他研讀。由於長期支起雙腿躺著看書，後來竟連肢體也變了形。當他自知病將不起後，就把全部心血傾注於對兒子的教育。從此「不再看數學方面的書，卻天天議論國家大事，常常講日本怎樣因明治維新而成強國」，時時以「大丈夫要以天下為己任」勉勵兒子，給他反覆講解這句話的意義，^{〔註 51〕}並立下要茅盾將來學習理工的遺囑。父親的榜樣，是無聲的教育；而他的「最後一課」，更使少年茅盾留下了終生難忘的記憶。

茅盾 8 歲那年父親病倒，三年後溘然去世。這期間茅盾雖未曾像少年魯迅那樣憂心忡忡地往返於當舖藥店之間，並在家道中落的途路上深切體受人

〔註 49〕 《我的小傳》，《文學週報》第 1 卷第 1 號，1932 年 6 月。

〔註 50〕 《我的小學時代》，《風雨談》第 2 期，1943 年 5 月。

〔註 51〕 分別見《我走過的道路》（上）第 77、68、78、14、51、64、89、114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 年出版。